

# “自造男人”之梦的三重误导

——基伦斯《随后我们听到了雷声》对美国男性气质的反思

隋红升, 陈海容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杭州 310058)

**摘要:**在约翰·基伦斯的长篇巨著《随后我们听到了雷声》中,主人公所罗门·桑德斯无论在人生理想还是婚姻方面都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其人格也经常处于分裂状态。本文发现,桑德斯所经历的现实与心理困境与他对男性身份的认知误区有着密切相关。种种迹象表明,桑德斯所认同的是美国主流社会长期以来所崇尚的一种“自造男人”式的男性气质,这种男性气质模式最大的弊端在于其评判标准与价值取向方面过度看重男性的外在表现而放逐了内在精神品质与道德诉求。通过对桑德斯这一男性人物形象心理与现实困境的多重展示,该作对这种男性气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基伦斯;《随后我们听到了雷声》;自造男人;男性气质;男性身份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505(2016)01-0015-06

## Three Misdirections of “Self-Made Man” Dream

——An Introspection of American Masculinity in Killens’s Novel *And Then We Heard the Thunder*

SUI Hong-sheng, CHEN Hai-r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In John Killens’s novel *And Then We Heard the Thunder*, the protagonist Solomon Sanders could not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both in his career and marriage, and his personality is often in a split state. This paper maintains that Sanders’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psychological predicamen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his wrong perception of male identity. All signs indicate that what Sanders identifies is a kind of “Self-Made Man” masculinity which has long been advocated by the mainstream society of America. This model of masculinity’s most serious defect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pays much attention to men’s external performance and banishes the spiritual and moral claims in terms of its judgment standard and value orientation. With a full

收稿日期:2015-1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非裔美国文学中的男性气概研究”(12BWW051)

作者简介:隋红升,男,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性别诗学研究;陈海容,女,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display of Sanders's psychological and practical predicaments, the novel carries out an incisive introspection upon this model of masculinity.

**Key words:** Killens; *And Then We Heard the Thunder*; Self-Made Man; masculinity; male Identity

## 一、引言

在当代著名小说家约翰·基伦斯(John Killens)的长篇巨著《随后我们听到了雷声》(*And Then We Heard the Thunder*, 1962)中,主人公所罗门·桑德斯(Solomon Sanders)是一个相貌英俊、体魄健壮、头脑敏锐并且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男性形象。与其他同龄的黑人青年相比,他有着较为优越的条件和光明的前途。然而在该作中,桑德斯无论在人生理想还是婚恋方面都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其人格也经常处于分裂状态。本文发现,桑德斯在人生理想、婚恋及其人格等方面所经历的困境和危机与他对男性特质的认知误区有着密切关联,是其男性身份认同危机的结果和具体表现。

种种迹象表明,桑德斯在其男性身份认同过程中,没有与美国主流社会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自造男人”(Self-Made Man)男性气质规范保持批判距离,而是对之盲目认同与遵从,把它看作是其男性身份认同的主要参照标准。众所周知,身份认同(Identity)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在每一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个人必然要与世界、与他人建立认同关系,并遵循文化编码程序,逐步确定自己在这一社会文化秩序中的个体角色”<sup>[1]</sup>。个体一旦对某种身份产生了认同,该身份所蕴含的文化编码程序就会发生作用,影响和左右着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从伦理的角度来讲,“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sup>[2]</sup>。

与比较看重男性内在人格与道德品质的传统男性气概(manliness)相比,现代男性气质(masculinity)更加看重男性的外在表现,主要靠男性在各种空间中对其性别角色的担当得以确证,其评判体系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和外在导向性。虽然男性气质这一外在评判体系在男性社会价值的实现方面有着某种推动作用,但其最大的弊端在于严重忽略了男性个体内在人格与品德的建构,忽略了男性内心真实的情感体验,这一点从诸多对男性气质大同小异的定义就可看出。在现代社会,男性气质规范包括“比较理性、无动于衷、有进取心、争强好胜、坚强自信、精通科学和数学并且以事业为中心”<sup>[3]</sup>等特性,认为男性应当“感情深沉、精确无误、富有理性、善于克制、坚忍不拔、精明实际、头脑灵活、能赚大钱、意志坚定,是个十足的幻想家”<sup>[4]</sup>。可以看出,这些男性气质规范更多地以男性的社会功能为依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确证男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实现。比如,在家庭领域,男性充当着“供养者”(provider)与“保护者”(protector)的性别角色,其男性身份的的确证则主要体现于对“养家糊口”角色的担当,因为“养家糊口是男性气质的核心部分”<sup>[5]</sup>,男性气质和男性“在家里的地位是建立在他身为‘养家糊口’者的基础上的”<sup>[6]</sup>。另外,“由于对权力、财富、体貌、性能力等外在因素的看重以及对内在精神品质与道德意识的忽略和淡化,男性气质在很多情况下已经不再是抵制恐惧的一种德性以及直面压力的勇气,而是一种压力与焦虑的源泉,一种异化人性的力量”<sup>[7]</sup>。

作为美国现代男性气质的一种典型模式,“自造男人”男性气质集中体现了这些性别规范及其潜在的弊端。根据迈克尔·S·基默尔(Michael S. Kimmel)的考察,“自造男人”这一术语是1832年亨利·科雷(Henry Clay)在美国国会上的演讲中提出来的,并“在19世纪中期成为美国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气质模式”<sup>[8]29</sup>。从那之后,这种男性气质模式在美国文化中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基默尔看来,“自造男人”式男性气质“完全是靠一个男人在公共空间中的所作所为获得其身份认同,以其所积累的

财富和社会地位及其所在的地域和社会活动性作为其男性气质的衡量标准”<sup>[8]13</sup>。换句话说,这种男性气质把“市场上的成功、个人的成就、流动性、财富”<sup>[8]17</sup>等因素看作是男性身份与价值确证的评判标准。正是因为对这种“自造男人”式男性气质规范的盲目遵从,桑德斯在其人生态度、婚姻等方面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其人格也经常处于一种分裂和扭曲的状态。

## 二、“自造男人”之梦与主人公的人生理想危机

在“自造男人”之梦的误导下,桑德斯不能恪守自己的人生理想,放弃了自己喜爱并擅长的文学创作事业,选择了军旅生涯。

文中交代,桑德斯在其孩提时代就已经喜欢上了写作:“从他能够记事时开始,他就狂热地喜欢上了写作,就喜欢在纸上写点什么。从十、十一或十二岁开始到现在,他已经尝试着写过很多小说和诗歌。……他在高中和大学的刊物上都有作品发表,他的一个抽屉里面装的全都是退稿通知单。”<sup>[9]56</sup>因为“他想用自己的语言和感悟写他自己的故事。……他喜欢舞文弄墨,喜欢隐喻的味道”<sup>[9]4</sup>。对他来说,只有在写作时他才能找回真正的自我,感受到人格的完整:“他写作时感觉很好,感觉自己像个男人,感觉自己完整、彻底和满足。”<sup>[9]56</sup>

然而,受“自造男人”之梦的影响,桑德斯背叛了自己早先想成为一名作家的人生理想,违心地投身军界,希望在军队中实现其自造男人的梦想。在他看来,在军队中当一名军官显然比当一名作家更现实,更能让他在短时期内最大程度地获得权力与财富的满足,而权力与财富则是现代男性气质最为重要的评判标准,是他实现“自造男人”之梦的首要条件。他希望利用自己英俊的外表、良好的教育、精明能干等优越条件在军队中不断晋级,最终能够荣归故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成为自己以后从事法律行业学习和工作的资本。其中,美女、房子、车子、机遇等现代男性气质的标志性因素就成了他孜孜以求的东西:

美女相伴——机遇——成功——出人头地——被人接受——生活富足——有自己的家产——汽车——地位。一言以蔽之,社会身份。<sup>[9]4</sup>

显然,这些要素几乎是“自造男人”式男性气质的全部内涵。受这种男性气质模式的影响,桑德斯满脑子都是飞黄腾达、出人头地等思想,即便在与新婚的妻子米莉娅(Millie)缠绵之际,脑子里也在盘算着未来的宏伟蓝图。而且我们发现他在妻子面前的自信与自豪感主要来自他在军营里出类拔萃的表现:“他告诉她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中的唯一一个黑人,而且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sup>[9]4</sup>在这种“自造男人”之梦的煽动下,桑德斯在美国军队中处处谄媚讨好白人军官,以自己“正确”态度和不辞劳苦博得白人军官的满意,从而让自己获得了小小的晋升,从一个最普通的下等兵变成了一个文书,一个代理下士。

然而,白人军官虽然欣赏他的“正确”态度,但对他只是利用,把他当成了军队中白人各级军官的奴隶,让他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各种琐屑工作,却从来就没有真心提拔他、重用他,也没有给他任何实权。不管他工作怎么努力,他还是个代理下士。可见,白人是不会轻易让他实现“自造男人”之梦的。另外,这种工作与他内心中一直向往的写作生涯可谓天壤之别,没有任何自主性和创造性可言。没完没了的案牍、文职工作让桑德斯身心疲惫,体质也变得虚弱起来。在一次军训中,曾经是径赛健将的他现在连一个小溪都跨不过去,竟然掉到溪流中差点淹死。显然,桑德斯为自己的“自造男人”梦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但没有如其所愿地在军队中获得实质性的提拔,没有成为令人敬畏的军官,反而让自己沦为白人军官的奴隶,而且让他本来健康的体魄受到严重的摧残。

### 三、“自造男人”之梦与主人公的婚恋危机

受“自造男人”之梦的蛊惑,在婚姻方面,桑德斯没有追寻自己真正的爱情,而是草率地进入了一种有性无爱、有肉体没灵魂、重物质轻精神的婚姻,这也为其之后的婚恋危机埋下了种子。

在小说第一章两人情爱生活的叙事中,我们看不到桑德斯与妻子米莉娅之间有多少爱情可言。两人在种族身份认同、职业选择、价值观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没有多少精神共鸣和深层次的情感交流。然而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两人在男性身份认同方面却有着相当的一致性,都把外貌、成功、财富、社会地位、性能力等外在因素看作是男性特质与男性身份的评判标准。也就是说,两人实际上都认同了美国主流社会“自造男人”这一男性气质模式。对米莉娅来说,桑德斯的英俊外表、极富男性气质的体魄、突出的性能力和事业上的“远大前程”所构筑的男性气质是吸引她的主要因素,是让她对这个“崭新的”丈夫充满无限敬仰与“骄傲”的前提,这一点从她对桑德斯的评价中就可可见一斑:

你这么挺拔、英俊而且有着具有挑逗性的棕色皮肤,而且你又敏感、聪慧,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雄心壮志。亲爱的,你是幸运的。在这个世界里你一定会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没有什么能阻挡你的脚步,你已经万事俱备、应有尽有。<sup>[9]4</sup>

显然,米莉娅已经把高大英俊、聪明能干和出人头地等外在因素看成男性价值与身份的衡量标准,并把这些因素强加给了桑德斯,而对后者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和人生理想她并不在意。另外,即便是在夸奖、赞扬自己的丈夫时也不失时机地对他进行鞭策和洗脑,不断强化他出人头地的念头。可以说,在桑德斯男性身份的建构过程中,米莉娅起到了重要的参与作用。只不过她参与建构的不是真正的男性气概,而是美国现代男性气质;其所看重和强调的不是桑德斯的勇气、人格尊严与道德品质,而是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履行男性的性别角色,满足社会对男性的性别期待。对于桑德斯而言,米莉娅无形中成了其所认同的这种男性气质的见证者和支持者,后者对其男性气质的仰慕和崇拜之情让他获得了一种满足感和心理支持,这也是他在明知道彼此在心灵有着巨大差距的情况下仍然与之结合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对“自造男人”男性气质的认同是桑德斯与米莉娅走到一起的“推动力”与“吸引力”。

然而,有着一定精神追求和情感深度的桑德斯很快就感受到自己与米莉娅之间的情感裂痕,品尝到了自己在婚姻问题上种下的苦果。

参军的第一周,在白人军官与黑人士兵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左右为难的桑德斯在训练过程中跑到电话亭给米莉娅打了个长途电话,很希望和她谈谈自己的感受,释放一下内心的压抑之情,结果非常失望:“她正打算去杂货店购物。他听到身后的军哨声,但她却把如此珍贵的时间浪费在关于那家杂货店的闲谈上,而彼此之间可谈的事情有那么多。”<sup>[9]24</sup>可见,在米莉娅的价值体系中,物质消费与享乐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在情感和思想方面,却无多少深度可言。另外,米莉娅把桑德斯在美国部队中的仕途道路似乎看得过于乐观和简单。即便在桑德斯在军队中困境重重、心力交瘁之际,她也丝毫不为之担心,反而在信中反复念叨她为他设计的发迹梦:

前一天他收到米莉娅的来信。米莉娅在信中说她一点也不担心他是否能够适应军队的生活,相信他一定能获得成功并且成为军官,相信他一定能不断进取、步步高升,如此等等。有时候她这些关于军官、成功等反反复复念叨的话题真让他烦心不已。她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sup>[9]43</sup>

可以看出,此时她只关心桑德斯是否“不断进取、步步高升”,是否能够获得成功,对他的真实处境和内心的感受则表现出相当的冷漠和麻木。显然,她对他的情感是模式化的,是按照美国社会对一个

男性个体的性别期待和男性气质标准来看待和要求桑德斯,这也无形中把桑德斯看成一种男性符号,一种平均数,而非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在桑德斯身心俱疲之际,她这种不合时宜的唠叨不但没有让桑德斯感到些许宽慰,反而增加了他的心理压力,让他感到更加烦躁不安。随着桑德斯对这种男性气质幻灭感的增强,他对妻子的这种洗脑也愈发反感,他们之间情感距离也越来越大,这也让他们本来就缺乏爱情基础的婚姻陷入了危机,这种危机在他后来遇到菲尼·梅·布兰顿(Fannie Mae Branton)时彻底爆发出来。

在该作中,布兰顿是桑德斯的心灵知己,甚至是他的另一个自我:“菲尼·梅永远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世事变迁而无所作为,而且任何事情一旦被她碰触过后就与之前大不相同了。你就是我另一个自我,菲尼·梅。你就是我渴望成为的那个自我。”<sup>[9]168</sup>可见,布兰顿才是桑德斯志同道合的灵魂伴侣。然而此时的桑德斯已经身不由己,已经没有选择的自由。一边是自己的知心爱人,一边是自己的法定妻子,桑德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他不仅在事实上背叛了他的妻子,而且也无形中伤害了布兰顿,让自己饱受道德与良心的谴责。

#### 四、“自造男人”之梦与主人公的人格危机

在“自造男人”之梦的蒙蔽下,面对美国军队中的诸多种族歧视现象和行为,一心想出人头地的桑德斯显得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不仅缺乏坚持原则、抗击非正义行为的勇气,而且丧失了基本的真诚,为自己的怯懦和无原则的忍让寻找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其人格经历着严重的危机。

实际上,桑德斯的人格体系中并不缺乏勇气,而且也有仗义执言的冲动和意愿。面对以绰号为“书虫”(Bookworm)的黑人士兵约瑟夫·泰勒(Joseph Taylor)为首的一些黑人士兵在军营中对菲尼·梅·布兰顿的污言秽语,他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斥责:“别再拿那个军人服务社的女士吹牛了,打住吧。不要因为那位女士对你们友好和善一点你们就忘乎所以了。”<sup>[9]155</sup>可见,他是一个有着相当正义感和是非观念的人,但他这种伸张正义的勇气在白人军官面前却大打折扣。

为了让自己在美国军队中步步高升,面对美国军营中白人军官对黑人士兵的种种欺辱性语言与不公正的对待,桑德斯总是表现得患得患失、顾虑重重,不敢站出来、勇敢地捍卫自己和其他黑人士兵的尊严和权益,经常报一种委曲求全、息事宁人的态度,甚至经常一厢情愿地站在白人军官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觉得黑人士兵的反抗行为做得过火。每当他想挺身而出之时,他的“自造男人”的梦想就立刻向他发出警告,警告他小不忍则乱大谋,警告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当然更是他的妻子的——发迹梦,此时一定要忍气吞声才行。可见,为了将来成为一个成功的“自造男人”,他丧失了反抗强暴的勇气,放弃了自尊,其男性气概也始终处于被压抑和阉割的状态。

不仅如此,桑德斯还为自己怯懦和无原则的忍让编织看似正当的理由:“这是一场捍卫民主自由的战争。这是他的战争,他对之心存信仰,他要为之全力以赴,奉献自己所有的力量。”<sup>[9]124</sup>即便得知“书虫”泰勒在酒吧里遭受到军地警察的侮辱和毒打后,他依然坚持自己对战争的信念:“但天杀的,他对战争就是有信念,这种信念他们是无法阻止的。”<sup>[9]159</sup>显然,桑德斯是在用民主、自由、正义等“宏大叙事”来美化战争,并以此掩盖自己不能坚持正义、缺乏抗击邪恶之勇气的事实,这也让他丧失了基本的真诚。然而在美国军营内外天天上演的种族歧视闹剧面前,这种自欺欺人的借口显得苍白无力,桑德斯本人也为自己的这种言不由衷和口是心非深感歉疚,这种人格分裂状态在他的战友斯科特因对白人军官的“冒犯”而被关进了军人监狱时得到充分的体现:

斯科特要在军人监狱里待三十天。虽然有点违背自己的意志,但他还是想知道斯科特的

近况如何,军人监狱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不管里面境况如何,斯科特除了自己外谁也怨不到。如果这一结果是有谁自找的话,这个人也是斯科特自己。他是个受虐狂——他头脑中的一种病态性格。<sup>[9]</sup><sup>44</sup>

这段话集中地体现了桑德斯人格体系中两个分裂自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一种自我以真诚、友善、良知和同情心等人文情怀为主导,这一自我让桑德斯为斯科特的处境担忧,同时也为自己的怯懦感到内疚,这显然是一个真实的自我,一个良知未泯的自我;另一种自我则是以野心、利益、得失等工具理性为主导,这一自我让桑德斯铁下心肠,无视真相,强硬地把斯科特所遭受的惩罚看作是咎由自取。在两个自我的较量中,那个以良知和同情心为主导的真实与真诚的自我刚一萌发,就被那个一心追求成功、权力、地位的自我压制了下去。

显然,在其所追随的“自造男人”式的男性气质模式的影响和制约下,桑德斯的人格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在真实与虚假、勇敢与怯懦、良善与冷酷之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小说在此似乎向世人表明,一种错误的男性气质认同和实践很可能会让人的良知泯灭,失去人格尊严与真诚,让人变得虚伪、怯懦和不公,并最终造成人格的分裂和异化。在基伦斯的另一部文学巨著《扬布拉德》(*Youngblood*, 1954)中,正是因为盲目认同和遵从了以“保护南方淑女的贞洁”为要旨的美国南方男性气质模式,约翰·杰弗逊(John Jefferson)等南方白人男性在白人女性和黑人身上犯下了种种不可饶恕的罪行,而“他们也没有对自己的罪行感到任何良心的不安”<sup>[10]</sup>。

## 五、结 语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看到,美国白人主流社会长久以来广泛推崇的“自造男人”式男性气质模式给桑德斯的几项重要人生选择带来了严重的误导,使其在人生理想、婚恋观、人格体系等方面经历了重重危机。通过对桑德斯这一人物形象所经历的种种人生危机的真实再现,小说《随后我们听到了雷声》对美国主流社会“自造男人”这一现代男性气质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警示广大黑人在认同和建构其男性身份时,不要盲目认同和遵从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奉行的男性气质模式,不要把权力、财富、名利和性功能等外在因素当作男性身份的衡量标准,而是要强调男性内在人格与道德品质对其男性身份建构的重要性,使其成为一种正面积极、催人向上的精神力量。

### 参考文献:

- [1]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2):37-44.
-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63.
- [3]MALTI DOUGLAS F. Encyclopedia of Sex and Gender[M]. Detroit: Thomson Gale,2007:622.
- [4]王先霏,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654.
- [5]R·W·康奈尔.男性气质[M].柳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8.
- [6]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M].祁阿红,张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98.
- [7]隋红升.男性气概[J].外国文学,2015(5):119-131.
- [8]KIMMEL M. Manhood in America: A Cultural Histor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2006.
- [9]KILLENS J. And Then We Heard the Thunder[M]. New York: Alfred·A·Knopf,1963.
- [10]隋红升.约翰·基伦斯《扬布拉德》对美国南方男性气概的伦理批判[J].外国文学研究,2014(3):102-109.